

世纪文睿人文典藏·触角文丛

反调

一本

无意时尚

无暇传统

无视市场

无关老套的

西方文化

散文集

又断

「美」李炜▲著
陈青于是▲译

世纪文睿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反调 又断

「美」李炜▲著 陈青 于是▲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调/(美)李炜著;陈青,于是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世纪文睿人文典藏. 触角文丛)

ISBN 978-7-208-10868-4

I. ①反… II. ①李… ②陈… ③于…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2977 号



出品人 邵 敏

责任编辑 张玉贞

封面装帧 许 菲

反调

[美]李炜 著

陈青 于是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16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48 千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68-4/I·1039

定价 25.00 元

献 给

陈先法 隐地 林贵真

目 录

- 13 在哲学的边缘 / 1
- 12 双情记 / 14
- 11 愚人动物园 / 24
- 10 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 / 37
- 09 月亮上最高的人 / 54
- 08 魔鬼与天使 / 74
- 07 致命的完美 / 85
- 06 哀郁的文字玩家 / 101
- 05 灰色手记 / 113
- 04 失败的脱身术 / 128
- 03 职业恶人 / 142
- 02 黑暗之旅 / 156
- 01 后记 / 180
- 00 进一步的参考读物 / 190

* 《死胡同里的冷幽默家》与“后记”部分由于是翻译，其余部分均由陈青翻译。

在哲学的边缘

一间老人院的小病房。屋子里摆着的，都是出自同一名作家之手的书作。

住在这儿的人早就不再阅读了。大多数时间他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莫名地焦躁不安。他已经到了老年痴呆症晚期。

在他情绪特别差的时候，唯一能宽慰他的就是把那些书放在他手里，指指封面上的作者姓名。这时他往往会眯起眼睛，一脸疑惑却又天真的表情，有时还会触摸名字的每个字母，似乎不明白那些符号代表着什么。

尽管如此，这总能让他安静良久。阅读一定曾是他最爱的消遣，所以他才会不停地抚弄这些书本，即便他已不记得自己这样做的原因，甚至不记得自己就是它们的创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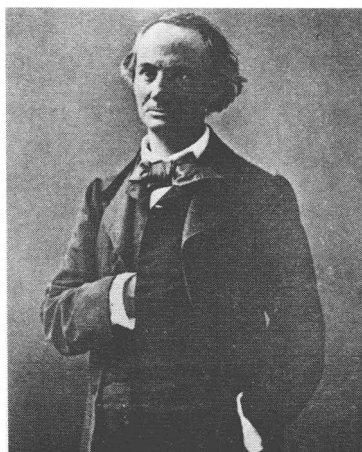
这是好些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事了。

时光再倒转六十年，慕尼黑，同一个人。

他信步走在城市中，像块新海绵一样，拼命吸纳周遭的一切新鲜事物。

在感受视觉和听觉冲击的同时，他仍试着保持敏锐的批判力。这么做并非是要评判德国。不，他所有的责难都指向自己的祖国罗马尼亚，那

齐奥兰，一个比叔本华还要悲观的思想家。他说他反对科学，因为这世界不值得了解。



波德莱尔，史上最优秀的“贵公子式”诗人之一。

里的“落后”和“渺小”一直使他苦恼。现在，望着一向现代、激进的德国，他更感到自己国家的微鄙。

于是，他开始在一篇篇杂志文章中赞扬德国的新任总理。“在当今的政治家里，没有谁能比希特勒让我更认同、更崇敬”，其中一篇文章这样开头，而结尾更令人咂舌：

希特勒对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的激情，并为一整套被民主与民族主义贬抑得毫无意义的价值观注入新生。我们都需要这样一种神奇的魅力，因为有太多惹人生厌的真理从未迸发出火花。

这番结论就算没让布加勒斯特^[1]的编辑部破口大骂，也让他们感到极为不解。在向这名年轻作家邀稿时，他们指明要的是针对德国国内刚发生的大规模杀戮的报道。这一系列在“大屠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做出的凶杀案是为了争夺纳粹党的控制权，而下令的正是那位“向政治斗争投入了火热激情”的先生。

但这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年轻作家非但没写预定的新闻报道，反而发出了一封公开的“情书”。显然他觉得几十宗谋杀案不算什么。喋血不但没有破坏希特勒在他眼里的神奇魅力，还可能将它抬得更高。哪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不佩服一个敢说敢做的“男子汉”？

听起来这像个单纯的道德故事：一名固执己见的纳粹同情者最终得到了报应，尽管正义之轮在转了六十多年之后才发挥作用。

[1] 罗马尼亚首都及最大城市（编者注）。

如果要从这个角度来解读齐奥兰（E.M.Cioran）一生中的这两个场景，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理解淡化了他在此期间的所有成就，让这一切变成“罪行”与“惩罚”二者之间的小插曲。

这种理解还会引申出齐奥兰本人绝不会认同的一个观点：世间存在着某种对善恶赏罚分明的法则和秩序。在齐奥兰看来，“不公正统治着全宇宙……在这个屠宰场里，袖手旁观和拔刀相助都同样毫无意义。”

说句公道话，齐奥兰究竟做了什么，要受到谴责，遭到报应？

除了他二十二到二十三岁期间在德国匆忙完成的一系列文章，还有那本在他年仅二十五岁就出版的《罗马尼亚变形记》。尽管这本书已经是他出版的第三部大作，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还会不断会有新书面世，这本书却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齐奥兰所有的著作当中，唯独这一本得到了全面且系统的研讨，也只有这一本发出强烈呼吁，要让一位无情的独裁者来彻底转变罗马尼亚，消灭一切阻挡变革的人事物，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民主本身。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本能让任何作者事后感到骄傲的书。所以齐奥兰在近七十岁时才会说：“一名作者要是在初出茅庐时做过些蠢事，就会像一个有着不堪过往的女人，永远都得不到宽恕和遗忘。”

其实，齐奥兰走向他那条耻辱之路的开端极其平常，或许连解释都显得多余。一个来到大城市的乡下人，只要他血管里流淌的血多过水——借用齐奥兰自己的比喻——就会立刻头晕目眩、心跳加速，因为他所见的事事幕幕都闪烁着超乎自己想象的美。

如果说是希特勒把这样迷人的美带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利而面临社

会和经济危机的德国，那么，罗马尼亚自然也需要这么一号人才。因为唯有像希特勒这样的领袖，才能让一个挤满了“永远沉浸在麻木和愚钝之中的农民”的国家摆脱自满，并带领她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用说，对于齐奥兰这样的愤青而言，如果让他选择“平淡”或“残暴”，他永远会挑后者。这一点他早已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就说得一清二楚：“唯有平庸之辈才会甘于‘温吞吞’地过活。”像他这样的人当然不会被“大屠杀之夜”这种琐事震撼到。

不过，他对政治的狂热很快就会消退。第三帝国制造的许多恐怖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很明显，唯有故意视而不见的纳粹支持者才看不出齐奥兰挑错了阵线。

因此，在1937年把自己“放逐”到法国之后，他会在一本书里问到一位作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是他的耻辱。”他自己答道。

无论这说法正确与否，用在齐奥兰自己身上，倒是分毫不差。当初他之所以不断书写自己的褊狭和愤怒，就是出于耻辱：因为他来自一个如此“不重要”的国家，“它的存在对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对一个自知自觉的人来说，耻辱只能是一条单行道，最终也只会来到一条死胡同。所以齐奥兰才会说：“我恨过自己的国家，恨过所有的人，恨过整个世界：到最后，唯一剩下可恨的，就只有我自己。”

尽管齐奥兰很快就会为自己的“罗马尼亚版纳粹党”这一言论感到懊悔，他却从未软化过对自己国家的偏见，直到去世那天仍在藐视她。

所以当一有机会，他就奔向法国。此后他努力营造的公众形象是个无祖国可归、无同胞可靠的文化流浪者。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困扰，反

而觉得自己的新处境充满了吸引力，甚至很有必要：“思想者因那些从他身上离开的和夺走的事物而充实。如果他碰巧失去自己的祖国，那更是横财一笔！”

于是史上最杰出的一场“变形记”在巴黎上演了：齐奥兰从一名有潜力的罗马尼亚辩论家变成了一位一流的法语作家。

要达成这一转变，他首先必须摒弃自己的母语——那个“阳光与粪便的混合物，充溢着对丑恶的缅怀、对抗脏的称颂”的语言。

所以，当整个欧洲都致力于阻止、加入或效仿纳粹势力时，齐奥兰却不亦乐乎地忙着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塑自己。他靠“喝咖啡、抽香烟、查字典，写出一个个勉强像样的句子”，以此来提升自己的法文水平。他深知，“一个人抛弃自己的语言去选择另一种，就会改变自己的身份，甚至改变让自己失望的原因”。

显然，对齐奥兰来说，不论身为一名法语作家会带给他怎样的失望，也不及陷于“一种文化精英要么不知要么不屑的语言”那么失望。

在初到巴黎的日子里，齐奥兰赖以谋生的只有一份微薄的研究生奖学金。至于奖学金所资助的那篇博士论文，他连笔都没动过。那不过是个借口罢了，以便他在事态变得血腥时——也就是说，当他在《罗马尼亚变形记》中大力宣扬的观点开始成真时——及时逃离他那个即将成为大屠宰场的祖国。

所以他在巴黎到处混吃混喝——学生餐厅、熟人家里，甚至当地向穷人分发食物的罗马尼亚教堂。最后此处想必不是他的第一选择；他一直极其反感基督教（或许这与他的父亲是牧师，而母亲又是基督徒女性组织的

领袖不无关系)。但他别无选择，因为那时他一贫如洗，又担心被驱逐出境。他甚至在纳税申报单上虚报更多的收入，以免引起逃税的误会，而被法国政府赶回罗马尼亚。

那几年，发生在齐奥兰身上最幸运的一桩事无疑就是在学生餐厅里遇到了布韦（Simone Boué）。她正是这位穷困潦倒的忧郁症患者急需的：一位忠诚谦和的伙伴，愿意无条件地牺牲自己，为他的一生提供所需和照料。

当齐奥兰第一本用法语写作的书在1949年面世时，他已经三十八岁，在法国待了十二年。

《衰亡短史》可说是一大胜利。它为作者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赏，争到了一个体面的文学奖项，让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更有甚者，它完成了齐奥兰的自我重塑。

但在经济层面上，这本书，以及下一本，甚至之后的每一本都对他毫无帮助。他还要等将近四十年才能看到自己的著作产生市场效应。

所以在这期间，生活依然艰辛。或许这也是应该的。齐奥兰是个标准的悲观主义者，白天被厌世和怀疑困扰，晚上又受失眠和忧郁症的折磨。这样的人如果居于膏粱锦绣之中，他的作品还有什么可信度？谁还会相信他那套阴郁的想法？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接受。

好在布韦一直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让他得以继续沉浸在悲观主义之中，把他当成病狮一样悉心照料，以便他能不时发出那种所有哲学家都梦寐以求、但只有极少数有能力实现的威吼。

因为齐奥兰对社会习俗毫不在意，自然也从未考虑过婚姻。不过，为了避免“白头偕老”这样枯燥无味的结局，他倒是跟布韦认真谈过，他们

俩该趁着彼此都还年轻时，一起走上绝路。或许，对一名货真价实的悲观主义者来说，再也没有比“同时自杀”这个更好的情人节礼物了。

无论如何，他们低调而貌似愉悦的同居生活仍然引出了一个小疑问。当他贬低爱情时，说它“伟大并且唯一的独创之处就是把幸福和悲惨搞得难以区分”，是否脑海里正想着某一对情侣呢？

至少在男女关系方面，齐奥兰并不脱俗；这世上多的是一方为了另一方做出种种牺牲的感情。但是作为一名思想家，这位一向爱唱反调的作家是否又称得上“独创”？

答案可能会令他的崇拜者失望。齐奥兰所受到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包括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古希腊犬儒学者和诡辩学者，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法国道德家，以及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从叔本华那里他汲取了绝望，把人生看作受苦受难，或许也初次接触到了佛教思想。

从尼采那里他学会了如何颠覆原则与论点，尤其那些被视为最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包括宗教信仰、正义和道德伦理。

从犬儒学派那里他继承了对舒适和愉悦的质疑及蔑视；从诡辩学派那里，他囊获了怀疑主义，以及所有的修辞手段。

从法国道德家那里，他抄袭了他们的散文风格。也许这是齐奥兰作为思想者最明智的一个选择。他模仿的风格非常纯粹，读起来总是优雅精简，即使作品空洞无物。

至于史宾格勒，齐奥兰吸取的是文化诞生和最终死亡的理念。只不过他依照自己的一贯作风，把这想法弄得更加悲观：

一切都表明，人类已经到达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地步。即使我们将目睹其他文明的诞生，它们也绝不及古代文明，甚至现代文明，更不要说它们终将不可避免地沦入相同的下场。

要是有人指责齐奥兰缺乏独创性，他可能只会耸耸肩膀。“我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他曾经宣称，带着谈论自己时常有的那股谦逊和冷漠，“我只充当了自己感觉的秘书”。

齐奥兰对警句的依赖无疑是让他从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一大特点。虽然不少哲学家也涉足这种形式，但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专门致力于此。甚至可以说，就连他那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也不过是一些“警句选集”，连接了许多相关题目的句子。

但齐奥兰为什么要坚持用这种形式写作？毕竟，受长度所限，警句无法提供解释哲学立场所需的文字空间。它唯一能展现的，是急智和敏思。

答案可能是，年轻时长篇大论地犯了错、出了丑，他不自觉地质疑所有思想体系，无论这些体系的出发点有多理想。“本质上说，每个观点都是中立的，或应该是中立的，”齐奥兰曾这样解释。

但人会赋予思想生命力，把自己的激情和缺点注入其中。这些思想也因而变得不纯粹并进而转为信仰，适时得到实践，成为活生生的事件。逻辑推理到癫病病发的路径也由此形成。意识的形态、教义的信条还有致命的嗜好都如此诞生。

对于齐奥兰这么一个反正统思想者，摆脱这种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采

用只字片语和自相矛盾的表达方式。简言之，警句。

但他选择这种写作风格还可能牵涉到另一个原因。不论他有多贫穷或多勤奋，他在性格上最接近的模式，其实是“贵公子”（dandy），也就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曾在十九世纪称赞过的那种时尚先锋。他们对自己的形象、言行非常挑剔，观点总要与与众不同，一味追求优雅，却又拼命装出一副没有强求的样子。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最灵敏的写作方式无外乎警句；即便是谈论痛苦和折磨，也要显得轻描淡写。

波德莱尔在描绘“贵公子式作风”时，形容它为一个“正在下沉的太阳；就像陨落的星星一样，光辉灿烂却没有热量，唯有忧郁。”这里预言的，不就是齐奥兰这颗未来的陨星？

“就像其他人去上班一样，我每天都去‘怀疑’那里报到”，齐奥兰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到。

但他这种充斥着负面观点的思想——老是不信任、不满、不认同——永远都只能迎合少数人的趣味。这也让他承受了不少“投机取巧”的指控。毕竟，破坏永远比创造容易得多，抱怨也比澄清轻松得多。

更不要说，一旦成为了警句家，他自然而然就和所有“传统”的哲学家划清界限，转而与“贵公子式”的作家扯上了关系，比如尚福尔（Sébastien-Roch Nicolas Chamfort）和儒贝尔（Joseph Joubert）、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和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这些都是出色的作家，文笔优雅、洞察入微，但没有一个拿到过“思想家”的头衔。也因为这样，齐奥兰的哲学地位才会摇摇欲坠。

这其中的讽刺意味恐怕只有齐奥兰自己才能体会。他竭尽全力脱离一

个在自己眼里太过“边缘”的国家，结果还是让自己被排除在外。虽住在法国的文化中心，却从未真正属于过这里。一向避世隐居的他，厌恶受到瞩目，从不试着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也不想要哲学友人，更别提追随者了。

但无论情况有多孤独悲惨，这一切都源于他自己的安排。“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名先知”，他曾经不无讽刺地说，“只要他一觉醒，世上就多了一点邪恶”。这样看来，齐奥兰所面临的这种“边缘状态”，可说是他作为思想者唯一谦逊的行为。永远置身局外，他才能继续“诋毁全宇宙”（他自己的话），而又不造成更大的破坏。

拜老年痴呆症所赐，他很可能是世上第一个忘记“齐奥兰”这名字的人。但他写的那些警句，它们是否也有可能被遗忘？

曾经有位名叫贝纳布（Marcel Bénabou）的法国作家想出了一套制造警句的“法则”。这套法则非常简单，只有两部分：总是成对出现的对义词（例如“罪行”和“惩罚”），以及警句中最常见的语法结构，例如：

（1）“甲”是“乙”其他形式的延续。

（2）“甲”如果不是“乙”，那它就不成其为“甲”。

只要把成对的词放入这些句子里，就能生成无数的警句。以“罪行/惩罚”这对词为例，我们马上可以得出：

（1）惩罚是罪行其他形式的延续。

（2）惩罚如果本身不是一种罪行，就不成其为“惩罚”。

这些句子显然不怎么出色，但乍看之下似乎也够深沉，甚至够机智，足以迎合普通大众。

这不是说齐奥兰也采用了贝纳布的法则；实际上，他很可能完全没听

过这套法则。再说，当贝纳布这篇半开玩笑的短论文出版时，齐奥兰已经写作了半个世纪。此外，他绝大多数的警句也不落入任何“基本”格式。要是他的手法那么容易就能摸透，齐奥兰也不会成为一流的作家。

然而，贝纳布的法则还是指出了一个问题：警句难逃肤浅。这不该令人惊讶，因为这种写作格式多半是靠文字的巧妙运作来达成效果；传达思想、隐含深意并不是它的主要目标。

齐奥兰之所以偏爱这种格式，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无法把信任交给文字，尤其是哲学术语。他知道——正如苏格拉底（Socrates）早就知道的那样——言语其实是我们掩饰无知的最佳手段。只要让一个人说上足够久的时间，他迟早会被自己的话绊倒。

这也是为什么齐奥兰声称“能写出警句的人都知道文字中隐藏的恐惧——那种和所有文字一起崩溃的恐惧”。既然这种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别忘了齐奥兰是个顽固的悲观主义者——何必要反复测验文字的脆弱性？长篇大论和简要表述：这两者真有区别吗？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哲学家？”齐奥兰在走完自己三分之一的哲学生涯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怎能蛮横无礼地与时间、美、上帝还有其他种种要素对抗？思绪不知羞耻地膨胀、跳跃。玄学、诗歌——这一切不过是一只跳蚤的非分之想罢了。”

“一本书可以像一场战争那样伟大，”英国作家、政治家兼贵公子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认为，“有些哲学体系导致了一些重大的革命，甚至改变了我们社会和政治的形态。”

不消说，齐奥兰的书没有一本激起过变革，连示威都没有。不过，除了《罗马尼亚变形记》，他写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鼓励任何起义。如此下